

浙
江
中
青
年
学
者
自
选
集

廖可斌 LIAO KE BIN

诗稗鳞爪

浙江大学出版社

SELF-SELECTED COLLECTION OF ZHEJIANG MIDDLE-AGE AND YOUNG SCHOLA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稗鳞爪/廖可斌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 10
(浙江中青年学者自选集)
ISBN 7-308-02207-2

I. 诗… II. 廖… III. 古曲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代-文集 IV. I206.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521 号

诗稗鳞爪

廖可斌 著

责任编辑 何明春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玉古路 20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 * *

850mm×1168mm 32 开 10.5 印张 26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308-02207-2/I·084 定 价:17.00 元

期待浙江学派

张浚生

奉派在香港工作了十三年，有幸参加了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伟业之后，今年四月，我回到浙江，受命主持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工作。我为能重返国内学术圈而兴奋。

甫到杭州，走进我曾经工作过的校园，看到一群群走向教室的莘莘学子，浓浓扑面而来的，是久违了的学术空气。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感触良多。

众所周知，浙江是一个文化大省，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大家，以下仅举其大者。汉有王充，他的《论衡》一书引用了丰富的科学资料，从多方面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谶纬神学进行批驳，发展了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自然观。宋有陈亮、叶适，他们以事功之学来抗衡、矫治程朱理学的墨

守成规、不思发展，曾经在宋代的学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宋代的另一大学者沈括，他的学术成就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更多人是认识他在自然科学中的成就，英国科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赞誉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实他的学识博大精深，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面也有重大贡献。明有王阳明，他提出“致良知”说，倡导“狂者”学风，使理学中的心学一脉取得完成的形态，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派，写下了明代思想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其影响及于清和近代，甚至辐射到东亚一带。明末清初有黄宗羲，早在17世纪中叶就创导民本制度，提出“工商皆本”学说，可以说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晚清有龚自珍，他在清王朝进入风雨飘摇之际，呼唤不为“人主”牢笼的豪杰之士，挺身而出改革社会，以“众人之宰，自名曰我”的近代命题，标志着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开端。鲁迅在中国旧社会的“寇盗”和“奴才”的包围之中，发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之战士者安在”的呐喊，他的思想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他如近代的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茅盾、吴晗、马一浮等人，都是十分杰出的大学者。我发现，历代浙江学者对传统和现实持着很强的批判精神，理论思维方面具有不可拘束的创新欲望和能力。那些大学者往往是开一代风气者。这不能不说是浙江人文传统的特色和优

长。

百年浙大，人文科学传统也是蔚为大观，从求是书院开始，有许多杰出的学者曾在浙大任教或求学，如陈独秀、蒋方震、钱穆、张荫麟、郁达夫、马叙伦、沈尹默、张宗祥、钱基博、汤用彤、马一浮、郑晓沧、马寅初、王季思、夏承焘、常书鸿、丰子恺、夏衍、谭其骧、王蘧常、姜亮夫，等等。他们以其杰出的人伦和学术思想，以及多方面的才干，不仅为浙大奠定了雄厚的人文传统，而且具有全国甚至国际性的影响。浙大文科的优秀传统和强大实力，他们有首创之功。目前浙大人文学科的老中青专家教授，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血脉。

“江山代有才人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浙江涌现出一批学术上卓有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一定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大多集中于浙江，有些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逐渐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学术群体，并将在跨世纪的文化接力中发挥中坚力量。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为这一批中青年学者出自选集，把他们推向全国、推向世界，既是对他们学术生命的一次检验和考察，也是对浙江学术界的一个促进，从而激励更多的年轻学者急起直追，汇成学术上奔流不息的钱江大潮。

但是，促使我深思的却是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浙江学术界尤其是浙江大学的学术命脉是否得以延续和光大。这就是：如何继承浙江优秀、绵

长的人文传统,推动学术进步,形成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浙江学派。今天,我把它提出来,希望与所有浙江中青年学者共勉,也希望他们为此作出扎实而有成效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并以此为核心,形成具有全国和国际影响的学派。

新的浙江大学的建立,我们有了国内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的大学,这为文科和理工科以及其他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创造了条件。不同学科间的启发、贯通和综合,必将启发灵感,拓宽视野,有利于学者提出具有原创性、前沿性的学术观点,有利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任何前人不具备的优势。

我相信,以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龙头,加上全国浙江学者的努力,上述历史使命的完成是可以期待的。现在我校出版社所推出的这一套丛书应该是一个好的开端。

面对中青年学者的力作,不揣浅陋,谨缀数语于书前,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于求是园

目 录

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与中唐文学发展动向	(1)
理学的二重性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	(18)
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	(32)
论宋濂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及其他	(48)
论台阁体	(65)
论景泰至弘治中期的文学思潮	(103)
论茶陵派	(120)
关于李梦阳“晚年自悔”问题	(137)
李何之争:学古主张的二律背反	(152)
唐宋派与阳明心学	(167)
严嵩与嘉靖中后期文坛	(187)
晚明浪漫文学思潮美学理想的三个层次	(195)
双重悲剧与《红楼梦》的主题	(214)
关公崇拜与近代民族心理	(238)
《水浒》、明代的“《水浒》热”、金圣叹的《水浒》评点	(248)
中国古典小说的谐俗倾向	(274)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主人公金碧峰本	

事考.....	(285)
《白牡丹》作者辨误.....	(309)
学术自述.....	(311)
论著目录.....	(322)

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 与中唐文学发展动向

文学艺术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特定的关于主体与客观世界、理性与感性、意与象的审美关系的理想,这就构成了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特定时代的文学艺术,就是当时特定的审美理想的表现。它对现实生活中审美关系的反映,是通过审美理想这一中介而实现的。因此,整个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便可以看成是各种审美理想不断嬗替的历史。就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定的审美理想而言,它又有一个从萌芽、发展到完美实现,然后又逐步解体以至消亡的发展过程。与它相适应的特定的文学艺术形态,便相应也有一个从萌芽、发展到繁荣兴盛然后又趋于衰落以至消亡的发展过程。在这二而一的发展过程中,主体与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意与象的

关系,由分渐趋于合,又由合渐趋于分,呈现为一种有规律性的展开运行。这就是文学艺术发展的根本规律。

审美理想乃是文学艺术的内在灵魂。从社会经济政治以至思想方面以及文学的体裁、题材、技法、风格特征这些方面考察文学的发展固然必要,而从考察审美理想的发展变迁入手,即运用美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史,则使我们在前两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更接近于对文学发展根本规律的深入揭示。

纵观中华民族审美理想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时代、古典时代和近现代。所谓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即指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理想。它与封建时代中华民族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维模式等密切相关,是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体系,具有一系列特定的美学范畴和质的规定性。这大致包括下列内容: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神人以和、物我两忘、与天地参等);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尽善尽美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意与象的统一(文质彬彬等)。很明显,在中国古典审美理想的上述特征中,贯穿着一个根本特征,那就是和谐。本文拟就中唐时期古典审美理想出现解体的情况及由此而引起的当时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略陈己见。

一、中唐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化 与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

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这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整个社会呈现一派兴盛景象。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表现为,即便是歌颂现实,那是出于一种真诚的信仰,而不是出于什么外在的要求或功利的考虑。他们也批判现实中

不合理的现象,但根本出发点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面理想,因此对一切都持一种宽宏态度。在当时人的眼里,生活中虽然还有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它仍然显得那样美好可爱,决不使人绝望。为这种生活理想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例如,即使时常吟叹“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维》)的孟浩然,我们在他的《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等清新优美的诗作中,也分明能感受到诗人热爱生活、眷恋真挚的友谊和美好的大自然的炽热情怀。就在高适描写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等景象的《燕歌行》中,回荡着的仍然是“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雄迈高亢的主旋律。总之,这时候整个民族心胸开阔,言行自然,性格乐观,充满蓬勃向上的热情。个人与社会、情与理,都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中。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文学艺术创作高度繁荣。人们感觉不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实现的尖锐对立,因此不必脱离现实生活,脱离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去苦苦地寻求某种特殊的理想,或孤独地品味某些内心的情绪,然后又费力地去捕捉挑选剪裁外在物象来表达它。理想就在现实中,两者已经合一,表现现实也就展示了理想。既然要吟唱的就是生活本身,那么只就生活本身加以描绘即可。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盛唐诗歌所描绘的,都不过是诗人耳目所及的身边眼前的真实景象,许多还属于日常生活的平凡画面。它们的形象是那样的亲切、自然、明白晓畅,但它们又都蕴含着一种饱满活泼的内在精神,洋溢着高尚清新的理想的光辉。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很难指说哪是“彼物”,哪是“此物”;哪是“他物”,哪是“所咏之辞”;哪是意,哪是象。因为一切物象都浸透着主观情志,主观情志就通过形象本身自然流露

出来。我们也用不着像读此前或此后的诗歌那样去猜测、比附、考据,只要接触到诗歌的表象,诗歌的意蕴就已经扑面而来,沁入我们的身心。总之,现实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决定了诗歌艺术中意与象的完美统一。因为诗人的主体精神是舒畅圆满的,这种主体精神的表现过程也是轻松自然的。所以在他们的诗作中,便蕴含着一种宁静清穆、高旷雍容的音乐美,能把读者带进一种深永的和谐境界。

还在中唐之世,诗僧皎然就试图以他出世人所特有的冷静超脱的眼光,对盛唐诗歌进行观照和分析。然而,除了对某些具体技法作点零散不系统的剥离评说外,他实在对这个浑然一体的存在无可奈何,至多只能从总体上摹写一下它的外貌,或描述一下对它的主观感受和印象,如所谓“萦回盘礴、千变万态”;“修江耿耿,万里无波”(《诗式》)等等。出于同样的原因,晚唐诗论家司空图更大规模地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在《诗品》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对雄浑、冲淡、纤秾等多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描摹。皎然通过对古典诗歌(主要是唐代诗歌)的仔细玩味,提出了“意中之静”、“意中之远”的概念;司空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概念。后人把这些说法归纳成“意境说”。意境说的实质,就是强调诗歌除本身的意象达到完美统一(合一为“韵”、“味”)外,还应该有不尽之意,还留给读者以想象回味的余地。这表明,中国古典诗歌在处理意与象的关系问题上,经过“比兴”、“情景”、“滋味”等发展阶段,终于达到了两者的完美统一,并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与此相应,诗歌理论也对诗歌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再以意与象的统一作为核心问题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这种可感受可摹写但很难加以分析的特性,皎然、司空图意境说的诞生,都是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的意象达到完美统一的反映。

个人与社会、情与理、意与象的完美统一，就是唐代特别是盛唐诗歌的灵魂，也是它的艺术魅力的根本所在。盛唐诗歌记录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美好的岁月，这一岁月将永远令后人怀念、神往，因此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将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不过，这种统一还是一种有限的统一。它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人们的情感与理性、个人的主体精神与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主观情志和客观物象的丰富性达到一定水平时所形成的一种统一。在它形成的同时，它也就暴露出封闭性的特征。主体与客观世界、情与理、意与象相互渗透，同时也就相互束缚。主体与客观世界统一在一起，主体精神毕竟还没有获得完全的独立自足性。意与象结合在一起，思维基本上还停留在知性直观的水平，还缺乏准确深刻性。主体精神必然愈来愈不满于这种状况，终将突破这种统一，向自我发展的更高层次迈进，这就势必造成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

然而，古典审美理想解体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思维本身的内部运动，而在社会现实的变化。社会现实的发展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不会在某一阶段上长期停步，势必向新的里程运行，因而不可避免地打破已与主体达到的统一。安史之乱后，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加剧，中国封建社会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逐步变得越来越不合理，种种社会弊端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人们从和谐统一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对现实产生不满，主体与社会之间遂形成对立。宋代以后，坊市制的打破，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市民生活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进步，使物质越来越丰富，也刺激了人们的感官欲望。而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对人心世风的控制，又强行倡导一系列

脱离违背人的自然生活要求的伦理道德规范。这样，主体自由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之间，主体的感性与理性之间，距离越拉越大，矛盾冲突越来越严重，再也无法保持平衡与和谐。

人们要摆脱这种矛盾，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克制压抑自己的感情欲望，牺牲个人现实生活中的自由，自觉遵循一种理性原则，追求道德上的高尚，获得精神上的安宁与自我满足，力图在物巧日繁、人欲日炽的现实面前，保持主体精神的独立。唐中叶初露端倪、至两宋而大盛的理学，就是人们这种心理趋向的产物。

另一种选择就是抛弃主观与客观社会相统一的理想，放弃对高尚的社会伦理道德目的的追求，退回到个体本身，退回到个人的感性世界中。在这里，个人的生活、感情以至买卖、艳遇等，才是惟一真实有意义的东西。个人的心理、志趣、性格、经历、命运等等，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等一系列社会公认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人们往往采取怀疑、嘲弄的态度。对整个现实社会，人们往往采取逃避的态度，将自己孤立起来，给自己制造一个特定的小天地，陶醉于自己所钟爱的彩釉玉钟、梅妻鹤子、篱边菊、霜时蟹、炼丹炉、青楼梦等等。

总之，社会现实的变化造成了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对立，从而引起了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袭及其分头发展。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把自己分成两面，一面理性地去应付外部世界；一面感性地保存自我。这就造就了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严重的双重人格化。有时这两个侧面还同时得到表现，并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如在许多元明清戏曲小说作品中，作者往往一方面道貌岸然地进行陈腐的说教，一方面又对那些展示感官欲望得到发泄和满足的刻露描写津津乐道。因为这种奇特的结合符合两重人格化的作者既要自我掩饰又要自我满足的双重心理，也适应了整个社会广

大欣赏者同样的心理，所以它竟成为当时文学艺术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总之，人的精神领域和整个现实生活都弥漫着一层浓厚的虚伪的迷雾，其下隐藏着的则是无数的污浊。特定的现实生活，是古典审美理想的土壤；特定的心灵境界，是古典审美理想的源泉。土壤变质，源泉污染，古典审美理想又怎么能不破灭，它所孕育的古典文学艺术之花又怎么能不凋谢呢？

二、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与语言的发展变化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乃是人们的整个思维活动（包括审美思维）的物质外壳。因此，如果说审美理想是社会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中介，那么语言又是审美理想与文学之间的中介。审美理想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语言的变化。审美理想对文学发展的制约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学语言这一中介来实现的。

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直观把握等特点，它们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的一系列特征。例如，汉语的文字一直保持象形的特征。汉语的词汇中，大量抽象的概念都是由某种具体的物象表达的，它们既有表层意义，又有不完全确定的深层隐喻义，可以留给人以想象引申的余地。又如上古至中古的汉语中，主动与被动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语法形态标志。主语和宾语的主动与被动关系，主要由上下文即语境决定，这样，句式的变换就非常灵活，人们造句时选择和调整句式也就非常自由，可以根据押韵、对仗、选词等方面的需要随意安排。有时这种主语宾语谁主动谁被动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也能给读者留下自由发挥的余地，造成一种特殊效果。再如，古汉语中许多词汇的词性不确定，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因此，人们往往把基本上属

于名词的词当动词用,把基本上属动词的词当名词用。形容词与动词、名词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这样往往可以丰富表现技巧,如化动为静、化静为动等等。其他民族的语言及现代汉语中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但都不如古代汉语那样突出。很明显,古代汉语的这些特征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及其审美特征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模式在盛唐臻于成熟。与此相应,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在此前感性与理性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此时也达到一种相对圆满,古代汉语也随之达到一种相对完善,同时也就产生了盛唐诗歌。中唐特别是宋代以后,这种圆满和完善又被打破、超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思维活动和语言的重大变化。例如,市镇经济的繁荣、市民生活的发展,就给语言增添了许多新因素。在文字方面,为了记帐、写商品招牌和传抄通俗文艺作品等,人们创造了许多新的俗字。汉语史的研究证明,中唐至两宋是汉语俗字滋生最繁盛的时期。在词汇方面,首先是词汇量大大增加。表示新事物的名词、表示新活动的动词、描写新现象的形容词,以及对旧事物、原有的活动和现象作更具体、更生动、更细腻描写的词大量产生,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语气词、谚语、成语、切口等。这个时期也是汉语史上新俗词产生最多的时代之一,这一点同样已为近年来取得很大进展的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所证明。其次是词式的演变。表现为词缀增多;词的双音节化继续发展;三音节和四音节词不断产生等。又次是词性的发展。由于词汇量丰富了,为每个词的分工专门化与词性的确定提供了条件。名词与动词逐步分工。原本属于实词的“子、儿、头”等逐步虚化为固定的名词词尾,使名词的词性有了明确的形态标志。“着、了”本来也是实词,魏晋时期实词性还很强,到唐代就基本上虚化为动词词尾,成了动词词性的形态标志。副词词尾

“地”起源于南北朝，盛行于中唐以后。形容词词尾“底”在唐代禅师语录中已常常出现。同时，表复数的名词和代词词尾“们”及表动作次数的动量词也产生并被普遍运用起来。在语法方面，主要起语法作用的虚词增多。判断句由过去的一般不使用系词到普遍使用系词，使主语谓语的关系更牢固。被动式进一步完善，除了继续沿用原有的“为……所”等句式外，“被”字句成为表被动的主要形式，主语与宾语的主动被动关系更加明确。处置式产生于三国时代，至此时也臻于完善。宾语特别是较长的宾语，可以用介词“把、将”等把它们提到谓语前面，使谓语与宾语的关系变丰富了。语法上的这些变化，都使句子变得更完整，句式更加定型化。

佛教的传播，理学的兴起，也引起了语言的变化。在文字方面，人们在翻译和抄写佛经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不少新俗字。在词汇方面，佛教和理学也都创造贡献了许多新词。有些词原就存在，但是靠了佛教和理学的传播才广泛被运用，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前者如“菩萨、佛、和尚、罗汉、世界、刹那”等；后者如“道、理、性、气、良心”等。如果说市民生活主要刺激了人们感性的丰富发展，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最明显，那么佛学、理学则主要是促进了人们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对汉语语法的影响最大。佛、理学使我们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也使我们民族语言的逻辑性大大增强。

总之，随着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及人们的感性与理性的分别发展，语言也呈现出感性化与理性化两种发展倾向。语言领域里的这种变化，马上对文学领域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古典诗歌受到冲击。那些新创造出来的俗字，大多是旧体字的简写，另一些则是根据形声规则造出来的。简体字笔画减少，线条更抽象化，象形的特征进一步丧失。形声字的形旁也